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施特劳斯集

刘小枫 ● 主编



刘小枫 ● 编

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

——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

Essays & Lectures in the Problem of Socrates and
Modernity by Leo Strauss

彭磊 丁耘 等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施特劳斯集

刘小枫 ● 主编



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

——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

Essays & Lectures in the Problem of Socrates and
Modernity by Leo Strauss

刘小枫 | 编

彭磊 丁耘 等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刘小枫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3
(经典与解释·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2)

ISBN 978-7-5080-4606-8

I. 苏… II. 刘… III. 苏格拉底(前 469~前 399)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B502.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2164 号

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

刘小枫 编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集惠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开

印 张:9.125

字 数:242 千字

定 价:2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渐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选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

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4. 迈尔编,《施特劳斯文集》卷一至卷三,其中施特劳斯的早期文稿收录较全,尤其卷二《哲学与律法及早期文稿》(译成英文的不多)。

施特劳斯生前在各类学刊上发表过的论文,还有好些没有收入上述文集^①——据说,有些文章没有收进文集并非因为不重要,而是出于别的原因。无论这一说法是否属实,如此“别的原因”对我们来说恰恰不是“原因”,因此有必要将这些散见的论文和讲稿结集。

这部《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以收录这些论文为主,兼顾施特劳斯的部分早期文稿,分两卷刊行。本卷“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收文共十四篇,其中两篇分别选自施特劳斯自编的《什么是政治哲学》和吉尔丁编的《政治哲学导引》外,余均为从未结集的散见论文和讲演稿。

苏格拉底问题是尼采与现代性扯上关联的:在尼采看来,由于苏格拉底这位哲人犯了唯理主义大错,才惹出西方现代性这一“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和漩涡中心”(《悲剧的诞生》,14—15节;亦参《偶像的黄昏》,“苏格拉底问题”)。海德格尔急切地接过尼采的论断,贸然前行……好些哲人跟着随之步入后现代的黎明;与此不同,施特劳斯接手审理尼采对苏格拉底提出的指控,并得出与尼采相反的结论:西方现代性恰恰是由于西方哲人不再理会或不再能理解苏格拉底问题的结果——从现代性问题出发,尼采提出了“苏

^① John A. Murley 编的《施特劳斯及其遗产:文献汇编》(Leo Strauss and his legacy: a bibliography; Lexington Books, 2005. xi, 937 p) 提供了施特劳斯所开拓出来的学问方向的出版物近一万五千条,不仅有整全的施特劳斯著述文献,还有施特劳斯弟子以及门人上百人的著述文献,这些著述多以古典作品的解读为主,已经深入到大学课堂。

格拉底问题”；同样从现代性问题出发，施特劳斯却通过重审“苏格拉底问题”看清了现代性问题的深远本相，并由此找到了超克现代性方案的方案。

李致远、黄群、郭振华等同志协助校读了部分译稿，还有各位译者的辛劳，在此一并致谢！

刘小枫

2007 年 12 月于沐猴而冠斋

目 录

编者说明/刘小枫	1
我们时代的危机（李永晶 译）	1
政治哲学的危机（李永晶 译）	17
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丁耘 译）	32
马基雅维里与古典文学（彭磊 译）	47
《霍布斯的政治学》德文版前言（娄林 译）	65
论卢梭的意图（冯克利 译）	69
德意志虚无主义（丁耘 译）	101
评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余慧元 译）	131
注意一种被遗忘的写作艺术（林志猛 译）	156
斯巴达与色诺芬的品味（陈戎女 译）	168
论柏拉图政治哲学新说之一（彭磊 译）	202
评色诺芬的《希腊志》研究（高诺英 译）	240
苏格拉底与政治学问的起源（肖涧 译）	253
剖白（何子建 译）	266

我们时代的危机

李永晶 译

[中译编者按]本文和随后的“政治哲学的危机”原为施特劳斯在1962年作的两次讲演,讲稿收入Harold J. Spaeth编, *The Predicament of Modern Politics*, Uni. Of Detroit Press 1964, 页41-54, 91-103, 迄今未收入任何施特劳斯文集。

诸位对我的美言善意让我油然而生起感动之情,不过,我还想简单地补充一句。我没有朋友们说的那么温良;对此,我的论敌们肯定毫不否认。言归正传,我今晚和明天要做两次演讲,其实只是一个,主题是我们时代的危机与政治哲学的危机。本来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划定这两次演讲的范围,而我的划法也许不是最好。因此,如果讲座显得不够连贯,还请诸位海涵;况且,我原本也没有打算面面俱到。准确地说,我要讲的主题是“我们时代的危机,作为政治哲学危机的后果之一”。

我们时代的危机,也就是我将阐述的要点,其要害在于对我们可称之为“现代方案”的怀疑。现代方案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它创造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新型社会。然而,时至今日,现代方案的弊病已经众所周知,并引起了普遍关注。这促使我们积极考虑如下想法:即,必须用另一种精神使这种新型社会亦即我们的社会重新焕发生机,这种精神不同于那种起初曾赋予这种社会以生命的精神。现代方案起源于现代政治哲学,源于十六、十七世纪出现的那种政治哲学。现代政治哲学的最终结果就是政治哲学概念自身的解体。对今天大多数政治学者来说,政治哲学不过是意识形态

或神话而已。

我们必须考虑恢复政治哲学。我们必须回到政治哲学最初遭到破坏的地方,回到现代政治哲学的诸起点,回到现代哲学还不得不与古式政治哲学一争高下之时。古典政治哲学源自苏格拉底,并主要经亚里士多德详加阐发。古今之争就发生在那个时候;而人们现在一般只把那场争论视为法英等国发生的一场单纯的文学争论;在英国,此次争论最著名的文献是斯威夫特(Swift)的《诸书之战》一书。事实上,那不仅仅是一场文学争论,它根本上是现代哲学或科学与古代哲学或科学之间的一场争论。只是由于牛顿的工作,那场争论才告完成:牛顿似乎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完全解决了问题。我们的使命就是重新唤醒那场争论,因为现代答案已经施行了三个多世纪,业已显示出其与古代答案相比之下的诸多优点,也显示了最恶劣之处。为了具有说服力,我必须尽可能贴近今天西方普遍接受的东西。我不能从今天只有极少数人同意的前提出发。换句话说,我不得不尽力证明某种相当程度上 *ad hominem* [偏私的论断]。但愿这不会招致误解。

为避免另一种误解,我想先给出今晚讲座的概要。西方的危机过去一直被称为西方的没落,某种意义上说的是人的最后没落或下降。这种看法站不住脚,不过,我们也不可否认某种或某些形式的没落已然发生。西方在力量上的没落最为显著,其生存本身如今正面临威胁。然而,这种意义上的没落并没有构成西方的危机。西方的危机在于,西方事实上已经不能确信自己的目标。西方的目标曾经是普遍社会(*the universal society*):一种由诸平等民族构成的社会,各民族又由自由平等的男人和女人组成。所有这些民族都可以借助科学提高自己的生产力,从而得到充分的发展。人们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有助于增强人的力量,并解除人的状态(*relief of mans estate*)。科学会带来普遍的富裕。在那种状态下,没有谁会再覬覦侵略其他人或其他民族。普遍的富裕会带来普遍的且完全正义的社会,就像一个完全幸福的社会。

如今,许多西方人已经开始怀疑这套方案,因为,共产主义显示了强大的力量,并极大地冲击着西方关于如何建立和治理这种普遍而正义的社会想法。西方和共产主义之间敌对的后果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绝无可能在可见的未来存在。政治社会过去一直是并在可见的未来也仍将是特殊的社会、有边界的社会,是一个关注自身改善的封闭社会。不过,我们既然已经具有了上述经验,就不仅必须重新确定政治的方向,还必须重新确定我们思想上的某些原则。

我这里要提三点。第一,这种特殊主义,或换一种说法,这种爱国主义果真不比普遍主义或全球主义更好? 第二,是否有理由期待正义与幸福会是富裕的必然结果之一? 富裕真的是美德和幸福的不充分但必要的条件之一? 自愿贫穷的观念是否包含某些真理? 对于美德和幸福而言,不自愿的贫穷是否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第三,相信科学在本质上服务于人类力量,这种信念难道不是一个错觉甚至可耻的妄想? 好,让我正式开始。

我们已深陷于某种危机之中,这点几乎不证自明。一天天的报纸报道着一个个危机,这些日常的小危机无疑可以看作一场大危机——我们时代的危机——的诸多部分或要素。我认为,这个危机的核心在于,某种起初尚为一种政治哲学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斯宾格勒(Spengler)曾将那种危机诊断为西方的下降或没落。斯宾格勒认为西方文化只是少数高级文化中的一种。但对他自身而言,西方文化又绝不仅仅是若干高级文化中的一种。对他来说,西方文化是一种全面综合的文化,是唯一征服了全球的文化。最重要的是,西方文化是唯一向所有文化开放了的文化,它既不把其他文化视为某些野蛮形式而予以排斥,也不把它们视为未开化的文化而对其俯就宽容。西方文化是唯一充分意识到了文化本身的文化。文化原本意味着培养人的心智,而文化的现代派生概念却意味着有多种多样的、相互平等的高级文化。然而,正因为西方文化是达到了充分自我意识的文化,它成了最后的文化;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西方的没落意味着高级文化的

可能性已损耗殆尽。人的最高可能性业已枯竭。然而,只要人的高贵使命尚存,只要人所面临的那些基本难题尚未在它们能被解决的程度上获得解决,人的最高可能性就不可能耗尽。因此,我们可以说——诉诸我们时代的科学权威——斯宾格勒的分析和预言并不正确。我们最高的权威即自然科学认为,它能轻而易举地带来无限的进步。那些基本难题要是已经获得了解决,自然科学的上述宣称似乎就没什么意义了。倘若科学能轻而易举地带来无限的进步,就不可能有一个有意义的历史终结或完成。只能有人类前进步伐的残酷中止:或因自然力量本身的作用,或因人类大脑和双手的造孽。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斯宾格勒可能也是对的。西方的某些没落已经发生在我们眼前。1913年,西方——实际包括美国、英国和德国——本该可以为全球立法而不用费一枪一弹。至少,西方曾在半个世纪里轻而易举地控制了整个地球。而今天,别说统治世界了,西方本身的生存也已遭到来自东方的威胁,最初可不是这个样子。从《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来看,似乎可以说,共产主义的胜利将是西方的彻底胜利,是英国工业、法国革命、德国哲学三者综合的胜利,这种综合超越了诸民族界限,或者还包括东方。我们看到,共产主义的胜利原本意味着西方自然科学的胜利;但同时,它也意味着东方专制极权的胜利。无论西方的力量多么衰落,无论西方面临的危险多么巨大,这种衰落,这种危险——否,应该说西方的失败与毁灭——都不足以证明西方处于危机之中。西方可以带着确定无疑的目标而光荣地走下历史舞台。

西方的危机在于西方渐渐不再确信自己的目标。西方过去一直确信自己的目标,确信可以实现所有人的团结。因此,西方十分清楚地看见自己的未来就是人类的未来。如今,我们不再有那种确信和清明。我们有些人甚至对未来感到绝望。这种绝望说明了当今许多西方的堕落形式。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除非致力于某个普遍的目标,献身于所有人的团结,否则就绝不能健康地存在。一个社会也可以是个健康的部落。然而,一个一度习惯于用某个普遍目

标来理解自身的社会一旦不再相信那个目标,肯定会变得浑浑噩噩。我们发现,那种普遍的目的直至前不久还得到过明确的阐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的那些著名的政府宣言就是例证。这些宣言只不过重复了最成功的现代政治哲学最初提出的目标:那种政治哲学原期望以古典政治哲学奠立的基础为基础,但反对古典政治哲学建立的大厦——古典政治哲学期望建立一个在真理和正义上俱是出类拔萃的社会。

根据那项现代方案,哲学或科学的本质不再被认为是沉思,而是行动。用培根那句美妙的名言来说,哲学或科学应该有助于消除人的等级(relief of mans estate)Novum Organum, LII)。应该为了增强人的力量而培育哲学或科学。科学或哲学应该使人能够借助理智征服自然,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哲学与科学原本一家,应该尽可能地促进进步,不断地创造出更大的繁荣。这样,每个人都将享受到社会或生命的所有利益,从而真正实现每个人的自然权利的全部意义,即实现每个人安逸的自我保存(按洛克的说法),以及实现那种权利所带来的一切;同时,每个人充分发展自身一切能力的自然权利也会与任何其他人同样的权利达成和谐一致。因此,这种不断朝向更大繁荣的进步也会变成或可能引起朝向更大自由和正义的进步。这种进步必然会朝向这样一种社会:这个社会平等地包容所有人,成为诸自由平等民族的大联合,其中各民族都只由自由平等的男人和女人组成。因为人们已经相信,在单个国家或少数国家中不可能有长期持久的繁荣、自由和正义社会。为了使世界不再威胁西方民主制,人们必须让全球民主化,让每个国家内部民主化,也让国际社会民主化。人们认为,单个国家内部的良好秩序以所有国家内部或之间良好秩序为前提。人们认为,朝向普遍社会或普遍政权的运动不仅由其目标的普遍有效性或合理性保证,而且因为朝向这个目标的运动本身似乎就是极大多数人的运动,代表着极大多数人的利益。只有极少数人,只有那些奴役着千百万同胞的人,只有那些竭力维护自己腐朽利益的人,才抵制这场运动。

以上是对人类境况的普遍观察,也是对我们这个世纪的特殊观察,这种观察仍然具有某种合理性,不是尽管而是正因为有了法西斯;直到最终爆发出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卑劣能量之后,事情才不复如此;因为托洛茨基主义只是个没有军队甚至没有将军的旗帜,终于被它自身的原则谴责并驳倒。一段时期以来,许多可教的西方人——遑论那些不可教的人——似乎都认为,共产主义只是与西方运动并行的一种运动:它就好比双胞胎中那个有点不耐烦、粗野和顽劣的家伙,它必然会变得成熟、坚韧和温和起来。然而,事情并非如此。除了在生死攸关的危险时刻之外,共产主义对那些兄弟般的深情厚谊往往报以轻蔑,至多表现出几丝假情假意;而在生死攸关的危险时刻,共产主义渴望得到西方的帮助,却又决心绝口不谈一个“谢”字。西方运动已经不可能把共产主义仅仅理解为一个新的外敌——自己数世纪来曾与之斗争的那种外敌。西方计划以自己的方式准备反对所有古老的罪恶形式,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计划不能提供任何措施以反对言辞与行动中新的罪恶形式。曾有一段时间,人们似乎还有充分的理由说,西方运动和共产主义具有共同的目标,即追求一种由自由平等的男人和女人组成的普遍繁荣社会;二者只是在手段上有分歧。对共产主义来说,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是最神圣的目的,为此可以不择手段。一切有助于达到最神圣目的的东西都分享了目的的神圣性,从而也变得神圣起来。一切有碍于实现那种目的的东西都是邪恶的。某个共产主义者曾把谋杀卢蒙巴(Lumumba)总理描写成一场应该受到谴责的谋杀,并以此暗示,还有不可谴责的谋杀,比如谋杀纳吉(Nagy)。

这么看来,西方运动与共产主义之间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更有类型上的差别。这种差别显然涉及道德,涉及手段的选择。换句话说,人们日渐明白,无论流血的社会变革,还是不流血的社会变革,都绝不可能消除人性中的恶。只要有人,就会有恶意,有嫉妒,有仇恨;因此,不可能存在一个不必使用强制规范手段的社会。同理,我们也不可能再否认,共产主义只要在实际而非名义上今天

继续存在,就仍将在以后继续存在:一个僭主出于对宫廷政变的恐惧而减轻或加剧自己的钢铁统治。不过,僭主也害怕西方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是西方唯一可以多少获得一些信心的遏制手段。

共产主义经验给西方运动提供了一个两重教训:这是个政治上的教训,它一方面关乎在可见的未来期待什么和做什么的问题,另一方面关乎政治原理的问题。在可见的未来,不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政权,不管是单一的还是联合的。事实上,现在根本不存在某个诸民族的普遍联盟,而只存在某些所谓爱好和平的民族之间的联合;除了这一事实之外,现存的那个联盟只不过掩盖了根本的裂痕。一个人要是过于认真地看待那个联盟,以为它是人类走向完善与普遍社会的一个里程碑,他就必定要承担巨大的风险;这将危及他竭力追求的进步本身,要知道他只能凭藉一个与生俱来的也许是陈旧的希望,此外一无所凭。可以设想,面临热核武器毁灭人类的危险,某个诸民族的联盟,无论多么残缺不全,总能阻止一些战争,确切地说,可以阻止某些侵略战争。但这意味着,其有效的前提是目前所有国界都是公正的,各国可自行决定各自的事务。这个假设是虔敬的欺骗,其诡诈甚至比其虔敬更明显。事实上,那些得到支持而改变现存国界的地方正是那些顺从共产主义者的地方。人们也不能忘记,诸同盟国法律上的平等与事实上的不平等之间存在着令人瞠目结舌的差距。这一事实上的不平等在“不发达国家”这个说法中得到了确证。据说,这个说法是斯大林发明的。这个说法暗示了这样一种决心,让它们充分发展起来。也就是说,让那些国家进入共产主义的阵营,或者投入西方的怀抱。这无视一个事实,即西方自称代表着文化多元主义。一个人尽管仍然可以争辩说西方的目的与共产主义一样具有普遍性,但在可见的未来,他也必须安于一种实践上的特殊主义。这种情况与人们经常提及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互对立的时代非常相似:虽然双方都坚持自己的主张,但也不得不接受敌手的存在并满足于某种不安的共存。这些都说明,在可预见的将来,政治社会仍然会像过去一样:政治社会仍然是一种个

别的或特殊的社会,其最紧迫的首要使命是自我保存,其最高的使命是自我发展。就自我发展的意义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出于同一种经验既怀疑了世界社会的有效性也怀疑了这种信念——相信富裕是幸福和正义的充分甚至必要条件之一。富裕治愈不了那些根深蒂固的恶。

我有必要对现代方案的另外一种因素说上几句,这可能需要更为细致的讨论。简言之,我们可以说,现代方案与古代看法不同:现代方案认为,社会发展完全取决于各种具体的政治或经济制度,而非品德的培养。这种看法意味着,要将法律与道德彻底分离,而非辨别二者之间的差异。除了既定的法律,的确还有一个需要启蒙的领域;换言之,还有一个纯粹的理论教育领域,它不同于道德教育或品德的培养。我们可以用现代方案的健将之一霍布斯为例来说明这一点。毫无疑问,霍布斯不是一个着迷于尼禄(Nero)之流的简单的绝对主义者。霍布斯原打算教诲那些启蒙了的绝对君王,即后来所谓的“开明专制君主”。不过,他的整个事业恰恰只保证了绝对王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要让专制君主变得开明起来,仍然只是个希望而已。

现在,这一境况在现代自由民主运动中以另一种形式得到重申。自由民主制自称是负责任的统治,在这种政治秩序中,政府要向被统治者负责。被统治者则应该遵守法律。但关键在于:为了负责,政府绝不能向被统治者隐瞒任何事情。“公开之契约,公开缔结之”——威尔逊(Wilson)总统这句名言最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当然,自由民主也意味着有限的统治,意味着公私分离。私人领域不仅必须得到法律的保护,还必须被理解为不受法律的干预。法律必须保护私人领域,而在私人领域中,每个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而行动或思想,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而变得任意或偏激。“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但事情没这么简单。我的家并不就是我的城堡;一张搜查令就会让它门户大开。真正的秘密之所不是家里,而是投票站。我们可以说投票站是众家之家,是主权之椅,是秘密之地。主权者

由个体组成,而这些个体却不承担任何责任,也无法被要求承担任何责任:不负责任的个体。这并不是自由民主制的初衷。其初衷是,这种享有主权的个体是尽职尽责的个体,是本着自己良心自我约束和自我引导的个体。

非常明显,尽责的个体和霍布斯笔下的开明君王一样,使我们陷入困境。你无法从法律上界定尽责的个体由哪些品质构成。你可以通过财产条款或文化测试等限定投票权,但不可能把投票权仅限于那些尽责的人们。只有通过非法律的手段,只有通过道德教育才能培养出尽职尽责的品质。因为在这方面没有适当的规定,诸位很清楚这个领域发生的变化。这个已然发生且正在发生的变化,可以称之为自由民主向放纵平等主义的退化。自由民主的核心是尽职尽责的个体,而放纵平等主义的核心却是欲望的个体。我们只需看看尽责的反抗者的事例;无论你怎么看待那些人,毫无疑问,他们就是那些甘愿为他们认为正确的东西而付出生命的人。而那些放纵欲望的人绝不会有丝毫牺牲自己生命的想法,因而也不会为了自己的欲望而牺牲欲望本身。这就是已经发生的道德堕落。

让我再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一巨大变化。在讲座的开头,我曾提到文化概念。在原来的意义上,文化词意味着关于人类思想的唯一文化。由于19世纪发生的一场变化,这个词变成了复数。如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之类的人类学家已经开始在某种较低层次上重复了斯宾格勒等人曾在较大范围上展开过的工作,而且产生了极大的效果。那么,文化在今天意味着什么?在人类学和部分社会学中,“文化”这个词通常被用作复数形式,如此一来,你就可以有一种郊区文化,有一种少年帮派文化(少年非犯罪文化甚或少年犯罪文化)。诸位可以说,根据当前这种文化观念,没有哪个人没有文化,因为他属于某种文化。与此同时,值得庆幸的是,古代的文化观念仍然健在。我这样讲时,诸位笑出了声,因为当我们说到一位有文化的人时,我们并不是指所有人都有教养或有文化。展望这种议论的结局,人们可以说,根据当前社会科学中的流行看法,一个人要